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九十期 ——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205b)

---

【历史疑云】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	罗 冰
【史料整理】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	王年一
【史实辨析】毛泽东制造的文革样板“上海一月革命”	何 蜀
【史实辨析】对上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	王年一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九)	周孜仁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历史疑云】

### 汪东兴交代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死亡真相

• 罗 冰 •

中共一直宣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自杀身亡的。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一九七八—七—00六六一二）号档案记载：田家英接到中央要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谈话的电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枪声惊动了警卫。汪东兴接获警卫报告后，和内卫朱国华赶到现场，证实田家英已死。汪东兴报告主席请示处理意见，主席说：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又请示总理，总理说：是自杀吗？要送医院验尸，这是法律手续。后又说：按主席的指示办。当天下午，是以化名，由公安部出面送去火化的。

一九八〇年三月，田家英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

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都就田家英家属来信的要求，做出批示。其中指出：田家英是自杀吗？为什么不送验尸？为什么有关档案会失落？田家英有关资料的去向如何？朱国华为什么自杀？对这些问题，汪东兴要有个如实交代。

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了话，给予汪东兴选择如实交代田家英死因和有关档案失落原因的机会，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汪本人的下场。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冲着黄、姚二人说：没想到清算到主席身上，连我现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也不放过。

黄克诚说：汪东兴同志，我们不是来跟你做交易，我们是代表党、纪委，给你机会。历史是不能颠倒的。田家英是自杀吗？这，你不清楚吗？最后，黄克诚，姚依林限汪东兴在三天时间内作出回答，反思。

一九八〇年四月四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代报告。

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一九八〇一四—〇〇九〇一四）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作了报告。主席听人说：人死了，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十八年了。从五六年以来，历次政治大事件中，他都有主见。我把他作为右派秘书。后来，他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性质就变了。他对另一个主席很尊敬，他也有野心。

从汪东兴这份如实程度可疑的交代材料，也仅能证实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但他杀的内幕仍是一团迷雾。问题是谁下的指示，究竟是内卫开的枪，还是汪东兴开的枪？内卫朱国华的死因，以及当年有关毛泽东对此一事件指示的档案材料为什么会失落呢？

当年，胡耀邦、陈云、彭真、黄克诚等提出：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田家英死亡事件，对汪东兴追究刑事责任，对内卫朱国华的死因立案调查。

陈云、彭真还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五五年、五七年，先后有过二次决议：不准，不允许对党内异己分子搞非法暴力处理、杀害，不准，不参与在境外对党内异己分子、国家敌人搞暴力处理、杀害等。中国绝对不照搬美国、苏联等国在境外对异己分子，敌人搞暴力攻击。汪东兴这样搞，是违纪犯法，要处理。

但，当时的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等，都反对公开事件，提出：事件搞到毛主席身上，搞大了，很多疑团都会提出来，怎么办？毛主席的声誉岂不全毁了！

一直到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彭真还坚持田家英之死的真相，十年、二十年后还是要公开的，并指出：田家英的死，毛泽东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否则无法对历史做出交代。

另据中办（一九八〇一五一〇〇七九七）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曾二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

华国锋还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以上就是中南海秘密档案中有关田家英死亡真相的记载。

□ 原载《动向》2002年三月号

~~~~~

### 【史料整理】

#### 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

• 王年一 •

肖关鸿、李逊夫妇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工人造反派代表“上海工总司”的兴亡》（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见本刊zk9608a）中说：“如果说，全国红卫兵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红卫兵，那么全国工人造反派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海工总司。”“上海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而且在全国造反派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它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推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毛泽东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每一个动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程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关于“工总司”的成立，下面提供一些资料：

#### 一、潘国平的说法

潘国平，生于上海，初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当兵，后因训练中受伤复员，被安排到上海玻璃机械厂当工人。“文革”中是“工总司”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之一，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常委，又是上海市总工会常委。“四人帮”垮台后被捕，判处有期徒刑8年。刑满释放后又犯罪，又被判处6年徒刑。下面是他的原话资料：

1966年11月6日下午2时左右，我随我厂的王□元、沈建柱来到愚园路“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我进去时里面已有一些工人和首都红卫兵。在陆续来了一些各工厂的工人以后，由首都红卫兵包炮、姜涛主持开会（引者注：潘国平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说，主持会议的是“首都三司”的姜涛，没有说到包炮）。参加会议的主要有：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潘国平、王□元、沈建柱，上棉17厂的王洪文、廖祖康、唐文兰、房佩仙，五一电机厂的丁德法，沪光灯具厂的黄文海，保暖瓶二厂的范佐栋，741服装厂的徐美英，上钢三厂的戴祖祥、穆南生，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童海龙，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的谢鹏飞、周国定、蒋周法，上棉31厂的黄金海、陈琳，822厂的岑麒麟，人民电机厂的张伯达等单位的人（引

者注：语言不通，原话如此）。

此会是“首都三司”召集。会议开始后姜涛讲要了解上海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叫在座的谈话。（引者注：潘国平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说：“主持会议的首都三司的姜涛只是说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来了解上海工矿企业文革的发展，让大家汇报自己单位的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原来上海工人造反之火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点起来的！）这时，叶昌明讲了市委在他们合纤所炮制假标兵“红雷青年小组”的经过情况。（引者注：潘国平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说：“这对大家的震动很大，因为其他人说的都是工厂范围里的事情，涉及到公司或者局一级已经不得了了，但叶昌明揭露的却是上海市委的问题。”）谢鹏飞讲了自己受文革工作队迫害的情况。王洪文讲了他所受文革工作队迫害的情况。戴祖祥、穆南生也讲了受迫害情况。随后包炮讲了全国和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并讲：现在每天都有不少工人来找我们，反映受迫害情况，要求支持，希望在座的能考虑成立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又说他们已就此事与一些到这里来要求首都红卫兵支持的工人商讨过，他们也有此要求。这时戴祖祥、岑麒麟马上讲他们已经找了一些人准备了一下了，并拿出一枚用石膏刻的公章，名为上海工人赤卫队。戴祖祥讲是他刻的。这样大家就各自与自己厂的人商量起来，决定要不要参加。我们厂王口元、我以及沈建柱也商量了一下，王口元决定参加。经过各单位的各自商量，基本都同意参加。包炮和姜涛讲赤卫队这个名字不好，现在都是造反派组织，你们可以成立一个工人造反司令部。这时王洪文讲，负责人要由大家选，并且不同意戴祖祥与岑麒麟作为当然负责人。并讲，我们虽然人不多，但是代表了不少工厂，代表了上海的造反派的要求，建议把名称加一个“总”字，定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引者注：潘国平在美国接受采访时对此有不同说法：“顺便提一下，在上海作家叶永烈和其他人写的一些文革回忆录中说这个名称中的‘总’字是王洪文加上去的，其实不是，而是沪光灯具厂的黄文海提出来，我和王洪文都赞成的。”）大家提出怎么选负责人，包炮讲，你们可以每个人先讲一下自己的出身、成份、简单经历和为什么要造反，然后大家民主选举一个召开成立大会的主席团；在开过成立大会以后，由参加“工总司”的各工厂的代表再正式选举“工总司”勤务组。选举要采取巴黎公社式的原则民主选举，随时撤换。这样，大家同意这个办法，开始各作自我介绍，选举成立大会的主席团。在各人的介绍中，王洪文讲他出身是贫农，本人是革命军人，并讲了参加过抗美援朝，后转业到上棉17厂，现在厂保卫科工作。介绍完毕后，大家选举了一个由王洪文、潘国平、蒋周法、徐美英、叶昌明、范佐栋、陈阿大等7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并公推王洪文负责。王洪文讲负责可以，但主持大会不行，因讲话讲不来。这样就推选我主持大会。然后休会。大家到对面饮食店去吃了晚饭。饭后继续开会，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会上决定了在11月9日下午2点借文化广场开成立大会。这时参加会议的各红卫兵提出成立一个大会秘书处，到开会那天要处理会场上的提案、发言等接洽事宜。我记得是由黄文海等人组成的，并决定叶昌明、谢鹏飞在大会上发言。关于整理发言稿、借会场、布置会场、出海报等等筹备工作，由各红卫兵组织包了。王洪文最后讲筹备处没有地方，这时“炮司”的红卫兵讲可放到他们那里，并讲在巨鹿路691号。并讲，愿意的话，你们可以跟我去认一认地方。这样王洪文讲，大家这几天可以经常到巨鹿路去通通情况，并要大家各自回单位组织人参加大会。就宣布散会了。当时，“首都三司”红卫兵还提出了由他们组织一个上海和外地驻沪的各红卫兵组织参加的联合调查团，对大会主席团成员的政治及各方面情况作一调查，在9号开大会前告诉大家。

潘国平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还说：“上海的工人都叫我潘司令，后来连毛泽东也这样称呼我。从座谈会到‘工总司’成立大会的几天里我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到上海交通大学找‘反到底’的严步东，因为市委书记马天水在他们手里。我通过他找到马天水，要市委派人来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同时我到康平路市委所在地找市委书记曹获秋，但没有找到；第二，我在巨鹿路原来‘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的地方召开了全市造反派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的联席会议，宣布了‘工总司’要成立的消息，希望大家予以支持。印传单和出海报都是红卫兵做的。我们弄了几架缝纫机在‘炮司’所在地做工人造反派袖章。做袖章的红布是我们到一

个布店去抢来的，说是‘借’，实际是抢。后来张春桥跟毛泽东说了抢红布这件事情，毛笑着说：‘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么。’”

## 二、黄金海的说法

1980年6月3日，黄金海写了题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筹备情况》的交待材料，全文如下：

1966年11月6日，有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吕英豪，同我们厂的谈炳奎讲，要三十一厂派几个人，晚上去首都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开会，是讲了解一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和“资反路线”的情况。谈炳奎叫仇歧贵、方松林和我3个人去参加。

晚上会议是在愚园路一个住宅房子里开的，会议是北京红卫兵、美术学院的包炮主持的（还有很多红卫兵，记不清了）。参加的人有：叶昌明（合成纤维研究所）、陈阿大（良工阀门厂）、潘国平（玻璃机械厂）、丁德法（五一电机厂）、戴祖祥（上钢三厂）、范祖栋（保暖瓶三厂）、谢鹏飞、蒋周法（铁路局）、黄文海（沪光灯具厂）、岑麒麟（822厂）、上棉17厂的王洪文、袁斯成、廖祖康和我们厂3个人。（主要参加者，各单位有2—3个，还有些我记不清了。）因为是首都红卫兵串联通知召开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也都不认识的。只有17棉几个因在10月份我同厂里几个人去过17棉了解他们去北京中央文革告状回来的情况时，接待过我们，所以见过一面。这次会议，还是仇歧贵打电话告诉17棉，他们才来参加的。

会议开始，主要是由谢鹏飞、蒋周法、戴祖祥等人控诉“资反路线”，讲他们单位怎么镇压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等，王洪文也讲了17棉文革工作队队长施惠珍是个“老板娘”，镇压文化大革命等等，我也讲了我仅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总支下来（办公室在楼上，车间在下面）同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打成“要党下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北京红卫兵讲，问题不在各基层，根子在上海市委。“资反路线”是上面下来的。要上海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否则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会打下去的。

会议开到12点多了，叫大家出去吃些点心，各个单位留下1个人，继续开，具体研究成立一个上海工人组织的问题，这点事先是没有打算的。继续开时，在北京红卫兵的煽动下，大家也同意成立一个组织。此时，岑麒麟和戴祖祥掏出一只用肥皂刻的图章，叫“工人赤卫队”。大家感到奇怪，事先并没有设想成立组织，怎么图章也刻好了？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就整了一下岑麒麟，说他是政治扒手。于是另想名字，北京红卫兵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抄者注：引文有误，“道理”后没有“，”，“绪”后有“归根结底”4个字。）叫工人造反队，多数感到叫“造反”听上去刺耳，经一青年提议后，加上“革命”两字，又鉴于北京红卫兵分裂成3个司令部的教训，再加上“总司令部”，于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就定下来了。争论中，王洪文是同意叫“造反队”的。

此外，会上又定下：成立大会于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开，会场由上海中学红卫兵“红反会”负责；参加会议的各单位作为“发起单位”；参加单位出1个人，组织成大会“主席团”，大会由王洪文主持；会上由叶昌明揭发“红雷小组”是“假标兵”的问题，谢鹏飞、戴祖祥揭发“资反路线”；请曹荻秋到会表态，目的是要他表态支持“工总司”组织及听听大家对“资反路线”的揭发（在大会上潘国平也发言揭发了“资反路线”）。

结束时，由于没经费，需要开会用红布和做一些袖章，在红卫兵“革命造反有理”的煽动下，王洪文、潘国平领了参加会议的一部份红卫兵即去八仙桥协大祥和金陵路一棉布批发部抢了几捆红布。当时说明成立“工总司”的情况，希望店里支持，并出示了工作证后拿的。后来

由市委给了帐。

以上是我知道并参加的全部过程。

### 三、王洪文的说法

1980年6月5日，王洪文在受审讯时，说到“工总司”的筹备和成立。以下抄自审讯笔录。（王洪文在笔录之末写道：以上记录我看过，与我所供相符。王洪文1980年6月12日。“）

“工总司”的成立问题，经过情况我简要说一下。“工总司”是1966年11月6日开始筹备，11月9日开的成立大会。10月中旬我和其他13个人到北京上访，告厂党委、工作队的状。上访期间，我们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大学、国棉三厂，还有很多地方，把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讲话抄了不少，有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等。

1966年11月6日，国棉31厂黄金海到我厂通知说，有一个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包炮（化名，东北大连人，是首都红卫兵“三司”的），找了一部份工人，串联了十七、八个单位：上海机车修配厂、良工阀门八厂、上钢三厂等，在上海华山路开会，叫我去听听。我带去了4人，头，是我。主要是包炮分析上海市委曹荻秋讲话的情况，是修正主义的，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我同意包炮的观点。他提出工人应该组织起来。江苏、湖北组织得比较早。大家一起议论了文化大革命制定的《十六条》中讲到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主力军为什么不动呢？应该组织起来。开始我不了解那人情况，有些犹豫，但在那种极“左”路线的情况下，采取个人报名，自己说一番个人情况。大家议论要组织起来，我也同意，主要是包炮的主意。组织起来人少怎么办？先筹备推选领导人。在这些人中我是唯一的党员，还有一个叫岑其林（公安部822厂技术员）是暂缓登记的党员。我就作为筹备组的负责人，还选了潘国平（上海玻璃机械厂，退伍军人），后来他变得很坏。

主席团成员选了：上海钢铁三厂戴祖祥，上海机车车辆修理厂蒋周发（这人曾在厂贴大字报，华东局抓了后放出的，后来也下去了），上海手工业局服装厂女的（名字想不起来），共选了五、六个人，也叫常委，灯具厂的秘书王文海负责筹备工作。其余的筹备工作是由红卫兵进行的，《宣言》是红卫兵搞的（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搞）。起草完后有两个工人（王文海、张柏生）参加。开会念了一遍，“哄”地表示同意，马上就印发出去。

问：红卫兵除包炮外，还有谁？

答：北京人不多，主要是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交通大学“反到底”红卫兵、中学生红卫兵，实际上工人当时参加的是少数，红卫兵是多数。筹备工人组织，实际上是红卫兵的作用。《宣言》事先我也不清楚。“工总司”还未成立，公章已刻出来了。后来说不行，又重刻了。

问：《宣言》是哪个人具体起草的？

答：是“包炮”（化名）。

问：他的原名叫啥？

答：他在上海就叫“包炮”，原名不大清楚。

问：工人谁参加起草的？

答：王文海（灯具厂）、张柏生。

问：起草完后，让你们看了没有？

答：只念了一遍，后就印发了（印发都是红卫兵搞的）。

问：《宣言》发的面多广？

答：发到全市。

问：外地寄过没有？

答：主要是上海，外地没有寄过。9日《宣言》搞好了，贴出去一张海报：“工总司”开成立大会。在这之前，派人通知了市委。

问：你这时串联了多少人？

答：还是原来那么多人，没增加。

问：成立大会在什么地方开？

答：文化广场（万人大会场）。

问：开会的人事先怎么通知的？

答：就发一张海报（写明什么时间、地点）。开会时大会场就坐满了，实际上两派人都有。

问：《宣言》撤出后，第几天开的会？

答：第二天开的会。

问：《宣言》是什么内容？

答：原文已不记得。“工总司”成立本身就是工人运动受压，市委操纵了领导权，所以《宣言》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打倒市委夺权。在会议中间，有一部份人不同意潘国平主持会，会场闹起来。会前通知曹荻秋要接见我们，曹没有来，两派就闹起来。

问：对立面那一派叫什么名？

答：当时还没有成立组织（抄者注：不久也成立了工人组织，叫“赤卫队”），是保市委的观点，这一派参加大会的人少，造反派的人多。

问：成立大会谁主持的？

答：开始宣布“工总司”成立大会，几句话后就发言。发言还未完，大会就被冲散了。这个大会计划开两个小时，实际开会半小时也没有，各派就开始辩论，抢话筒的时间多。总算是成立了“工总司”，还做了一面旗。回过头来看，“工总司”成立本身，它的基本观点是打倒上海市委，夺权，所以后来的一系列其他行动是围绕这个目的的。

问：“工总司”什么时候成立的？

答：11月9日（抄者注：《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落款的时间是“1966年11月9日”。《宣言》中充斥了当时流行的时髦语言，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

从以上提供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是“首都三司”（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宠儿）驻沪联络站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委托”一手扶植起来的。它在出世之后，立即制造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将在以后提供有关资料。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2期）

~~~~~

## 【史实辨析】

### 毛泽东制造的文革样板“上海一月革命”

• 何 蜀 •

文革时期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势力当中数上海的造反派最走红，而上海造反派得以起家的关键事件是所谓的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的“一月革命风暴”。（1）如今的当代政治史资料似乎都把这一事件视为当然的史实：“1967年初，在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革命’。它成了‘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全面夺权新阶段的标志，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由上海开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紧跟而上的一市四省的夺权，构成了1967年春

全国夺权的第一个大浪潮”〔3〕。然而，1967年初的原始历史记录却表明，那时“夺权”浪潮并非起于上海，而在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其实也并未夺得上海市的党政权力，这场所谓的“一月革命”即使不算子虚乌有，至少也是名不符实。当时，毛泽东不理睬其他省市真正抢先夺得当地党政权力的造反派，却独厚上海那并无领先“功劳”的工人造反派团体，凭空给他们“御封”了一个“一月革命风暴”“发起人”的桂冠。通过对这一史实的分析，可以再次看到官定历史材料被政治领袖任意玩弄的明显痕迹。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当代史研究中许多已经习惯成自然的说法，其实都只是在单纯地附会官定史本，如果仔细查考，破绽漏洞甚多。还历史的真面目始终是独立的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 ◇ 1967年初全国的“夺权”浪潮和上海的“一月风暴”

1967年1月，造反派夺取当地党政机关权力的浪潮席卷中国各地。该月10日，黑龙江造反派组成省级机关接管委员会，夺了省级机关的权。1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已于12日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该通告于同月25日在《人民日报》刊出，该报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月16日，哈尔滨军工学院等23个单位的“红色造反者”在哈军工集会，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夺取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1月17日，湖南长沙市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1月18日，全国财贸系统造反派举行“反对经济主义”誓师大会；新华社于21日以“把财贸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为题加以报导。同日，聂元梓部署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连夜派出大批人员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及北京市人委各部夺权。1月19日，文化部被造反派夺权。同日，首都出版系统造反派向全国出版系统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书，其中第一条就是“立即夺取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夺取每一个出版阵地”；新华社21日全文播发此呼吁书，《人民日报》22日转载时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1月21日，广东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及广州市委、市人委的权，次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夺权通告。同日，徐州市两大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总部”和“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宣布接管市委、市人委和公检法一切权力。

在这场全国性的“夺权”浪潮中，1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20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出了《人民日报》次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宣称：“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

这篇社论肯定了已经发生的造反派“夺权”行动，推波助澜，进一步煽起了全国范围的造反派夺权风暴。当时有些地方（如山西、青岛、贵州、山东、黑龙江）的夺权得到了中央的正式承认〔4〕，有些地方的夺权结果虽未得到中央的正式承认，但也大多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

在1967年初中央承认的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上海这四省一市的夺权过程中，上海并不是其中的“开端”，上海的造反派又迟至2月才真正完成夺权过程，所以，上海的夺权过程其实是落在其他省市的后面。上海造反派夺权后曾于1967年2月5日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以代替原来的政权组织，这个举动曾名噪一时。但实际上以“公社”这个名称命名新的权力机构，并不是上海造反派自己的发明，而是他们经“中央文革”授意，袭用了1月27日聂元梓、蒯大富等筹划组织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名称。〔5〕在这场全国性的造反派“夺权”浪潮中，上海市的造反派既未领风气之先，也未创奇功于后，却独享了全国“一月夺权风暴”发源地之誉。为什么在夺权行动中明显落后于不少省市的上海反倒后来居上变成了全国夺权的样板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所谓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真



相。

1967年初在中央鼓励下出现的全国性“夺权”浪潮，是指造反派将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权力夺到自己的手里，然后代替原来的党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真相是，上海的造反派虽然在1967年1月4日和5日先后夺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市委机关报的控制权，在1月6日又联合召开了“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6），但他们并未夺得上海市委的权力；相反，上海最早发动夺权行动的部份造反派组织因得罪了“中央文革”代表张春桥、姚文元，不但夺权失败，而且遭到打击。因此，在1967年1月的上海，其实出现了一个“中央文革”操纵下的打击“夺权行动”的局面。那时，上海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几乎与其他一些省市的造反派同步开始发动夺权活动，从1月15日到2月2日先后四次试图从原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手中夺权（7），但由于“中央文革”驻沪大员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对和破坏，这些夺权行动均告流产。张、姚二人其实并不是反对“夺权”本身，而是反对不受他们操纵的“夺权”。那些参与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事先未请示他们，目无他们的领导（上三司竟然发布对张、姚二人的“任命”），或是有同张、姚支持的其他造反派组织争权的意图。因此，张、姚二人视这四次夺权行动为不利于自己控制上海局面的行动，不但千方百计将其破坏，而且还试图分化瓦解和镇压领导这四次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上三司”、“红革会”、“二兵团”等）。正当“中央文革”在全国各地煽动夺权时，上海的部份准备夺权的造反派却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压制。也正因为如此，1967年1月28日，上海的部份造反派组织由“红革会”领头，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同时，不同工人造反派组织之间也发生了武斗（8）。显然，在当时全国“一月风暴”的夺权“交响曲”中，上海的造反派组织不但没有完成夺权行动，相反却开始攻击“中央文革”成员、并掀起内斗，所奏出的其实是一阵不和谐音。

上海市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支持的造反派直到1967年2月5日才宣布夺得市委、市政府的权力。与其说这是上海造反派的“成就”，不如说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成就”。张、姚不仅成功地压制住了不听他们指挥的造反派组织，而且把他们摆布利用的造反派组织推到了全国“一月革命”发起者的高位。王洪文等工人造反派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全国性政治人物，是因为他们从领导造反组织的早期起就充当著“中央文革”的“御用工具”。

1966年底王洪文等领导的上海“工总司”挑起与“保守派”“赤卫队”的武斗，“赤卫队”的一些人要赴京告状，“工总司”则派人在昆山县追打、阻拦，致使冲突扩大，沪宁铁路部份列车停驶。周恩来于1967年元旦凌晨打电话指示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同群众组织协商，处理好“昆山事件”，强调“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一定要搞好。”陈丕显当即通知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到市委招待所开会，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起草了“告全市人民书”，由12个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及陈丕显签字后交《文汇报》社赶印了29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9）

1月9日这些组织又发出了《紧急通告》。这两个文件的中心内容不是夺党政机关的权，而是配合党政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和“反对经济主义”。正因为如此，张春桥、姚文元都不支持这两个文件。1月2日（即“告全市人民书”正在起草期间），“工总司”头头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等乘飞机到北京向张春桥、姚文元请示对策。3日夜，张、姚在《解放军报》社二楼接见王洪文等人，授意他们不要与陈丕显一起解决铁路交通运输和“经济主义风”问题，要他们等陈出来工作后抓住陈丕显的“辫子”、再把陈打倒。在1967年1月里，王洪文处处按照张、姚的指令行事，采取不与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合作的姿态（10），等待陈丕显犯错误（11），但并未发动夺权行动。当时，张、姚正忙于和自行夺权、不听他们指挥的其他造反派组织周旋，阻止那些组织的夺权活动。（12）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成就”纯属子虚乌有。

◇ 上海是如何变成“一月风暴”中的夺权样板的？

在1967年1月里，上海的造反派并未完成对市级党政机关的夺权，张春桥、姚文元操纵著王洪文等人的“工总司”及另一些“御用”造反组织，既对原上海市委的权力虎视眈眈，又害怕不听自己指挥的造反派组织夺得权力，于是，那些自行夺权未成的造反派组织与张、姚的矛盾终于激化了，出现了声势逼人的“炮打张春桥”事件。可以想见，单凭张、姚两人自己的力量，他们很难把这段当时上海民众几乎人所共知的史实篡改成一场“成功”的“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那么，受张、姚支持的王洪文等上海造反派是如何被戴上“一月革命”发起者的“桂冠”的？上海又是如何被吹成所谓的“一月革命”的发祥地和夺权的样板呢？究其根源，文革中上海这个“夺权样板”的制造者其实是毛泽东。或许正因为凭空造出这个“样板”的是毛泽东，所以至今官史版本及其诠释者仍然不敢点破其中之假，致使一传再传的谬说时下仍然在给张春桥、姚文元脸上贴金。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13）这个讲话以夸张的语调把上海《文汇报》的夺权提到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的高度。当时这段讲话虽未正式公布，但已被造反派传到社会中，其主要内容也写进了《人民日报》次日转载上海造反派“告全市人民书”时所发的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中，但其中未出现“夺权”字样。1月11日，上海造反派发出“紧急通告”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去“贺电”，吹嘘上海造反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说法虽未使用“夺权”之词，但充满了鼓励夺权的暗示。

1月15日下午，北京及外地造反派150多个组织在北京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欢呼中央给上海造反派的贺电。陈伯达和周恩来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主题是号召各地造反派向上海造反派学习，反对经济主义、搞好“抓革命促生产”、实行大联合。这两人在讲话中不仅只字未提“夺权”，反而一致强调反对“接管风”（此时所谓的“接管”实际上是夺权的另一种说法，后来才统称为夺权）。陈伯达明确地说，“接管风”是走资派的“新花样”，让造反派接管，他们跑到台后，让我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得不好，他们看笑话。他提出，除个别地点、机关外，应该大量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周恩来在讲话中也强调了不要形成接管风（14）。但是，当天大会后毛泽东立刻干预，使局势出现了重大逆转。据王力回忆：“工人体育场开10万人大会，陈伯达讲话，一是夸上海，二是说自下而上‘夺权’的口号不对。只能监督，不能夺权。还说‘上海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会一开完，主席就知道了，马上召开小范围的常委扩大会，批评陈伯达。主席讲了一大篇道理，主要内容都在《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中。”（15）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王力、关锋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起草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经毛审定后广播并发表。此文称：“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上海）创造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这是第一次公开称上海造反派已经“夺了权”并将其树为“样板”的官方说法，尽管当时张春桥、姚文元正在竭力阻止破坏不听其指挥的上海部份造反派组织的夺权行动。

1月21日，新华社播发“全国第一个联合起来的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于18日举行10万人的“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的消息，以“把财贸

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为正题，突出了夺权这一主题。这次大会通过的“向毛主席的致敬电”中写进了“向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学习”。这样，毛泽东制造出来的“上海造反派夺权”的“成就”，就通过其他造反团体承认的方式，被确认为事实了。

距《红旗》杂志发表毛泽东审定过的评论员文章才一周，1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经毛审定的社论，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进一步号召全国造反派起来夺权。但是，在这篇社论中却颇为引人注目地只字未提上海的夺权，上海这个样板暂时消失了。或许，毛泽东也发觉，夸赞他制造出来的这个上海“夺权样板”，可能还为时过早，因为这个“样板”的“夺权过程”其实根本还未完成。又过了9天，1月3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却又再次肯定了上海造反派已经完成夺权，并且第一次由官方传媒公开了“一月革命”这个提法。这篇社论说：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就这样，“一月革命”的桂冠终于正式戴到了上海造反派的头上，“上海一月革命”从此“载入史册”，成为样板。此后，这场毛泽东自己吹出来的、子虚乌有的“一月革命成就”，又被毛周围的佞臣“归功于”毛泽东的“英明伟大”（16），变成了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一个“辉煌业绩”。

为什么毛泽东未把真正在1967年1月完成了夺权并得到中央肯定的其他几个省市的造反派树为样板，却把落在后面、迟至2月才完成夺权的上海造反派树为“一月革命”的样板呢？各地所有这些夺权行动无不是在“中央文革”授意和支持下进行的（17），上海的二月夺权并非“中央文革”扶持的独此一家；而完成了工人造反团体夺权的也不止上海一处，山西省的造反组织也是以工人为主要骨干，而且夺权比上海还早，还得到了著名全国劳模陈永贵、李顺达和解悦的支持（18）。

笔者认为，毛泽东先入为主地造出一个“上海夺权样板”，是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不遗余力地推行文革路线的人的一种刻意扶持。尽管上海的造反派夺权较晚，但文革之火是从上海点燃的。江青在毛支持下伙同张、姚在上海密谋炮制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革的序幕，为发动文革立下了“头功”。而且，对毛来说，江、张、姚等人在理解、阐发和贯彻他的文革意图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方面，无疑更有政治上的价值。毛泽东将上海树为文革夺权的样板，将“一月革命”的“桂冠”奉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伙，是毛精心扶持、鼓励“四人帮”结帮成势的重要步骤。

#### ◇ 文革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官式诠释中的漏洞

毛泽东定了基调，“上海最先夺权”、“从上海刮起一月夺权风暴”的说法，从此在中国就众口铄金地变成了有关文革史的“常识”，很少有人再去认真思考识别其中的种种漏洞。其实，给“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官定说法圆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大的漏洞是时间不吻合。上海造反派正式宣布的夺权日子是1967年2月5日，如何把2月的事说成“一月风暴”呢？于是，后来的许多官式解释就在改变“夺权”的定义上作文章，硬把一月内发生的事塞到“夺权”的名义下，好避开事实方面的时差。

一种现在常见的说法是，上海造反派在1967年1月6日召开了“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就等于是夺了权，此说首创者是张春桥（19），一直被沿用到现在。（20）那次会议其实仅仅是一次批判市委的动员、誓师会，会后张、姚支持的造反派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宣布夺权。第二种说法是，“这次大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

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的手里。因此，1月6日打倒市委的大会是所谓‘一月革命’的真正标志。”〔21〕夺权与否的标志不是原党政机关是否瘫痪，而是看造反派是否正式建立相应级别的新的“临时权力机构”或“新生红色政权”，上海造反派的“上海人民公社”是2月5日才正式问世的。

第三种说法是，上海造反派1月5日发出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就意味著造反派向原市委和市人委夺了权，即所谓的“一月革命”。此说源于1967年1月16日发表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篇文章称毛泽东决定广播“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是支持上海造反派“在一个市的范围内”夺权。这一说法一直沿用到了现在。〔22〕其实，上海造反派当时发布的这两个文告只字未提“夺权”，文告本身则是上海市委与造反派团体合作、在市委“主持”下产生的〔23〕，所以根本不是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的结果。

虽然“四人帮”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澄清这段关于“上海一月革命”的史实仍有其必要。这是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本应有的治学态度。如果中国的当代史都能以客观准确的面目示人，我们对过去几十年轨迹的认知无疑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注释：

〔1〕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在“1967年1月6日”条目中有如此记载。

〔2〕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见第九章“从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

〔3〕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见第三章第一节“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

〔4〕例如，1月25日《人民日报》以“热烈欢呼贵州革命左派重掌大印”为题重点报导了贵州造反派夺权的情况，新华社31日全文播发了贵州造反派的夺权通告和《人民日报》2月1日社论《西南的春雷》。1月27日，山东造反派在驻军支持下宣布夺了原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委的权。2月3日，山东造反派与驻军指战员一起举行盛大集会，宣布“旧省委、旧省人委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死亡和新的临时权力机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人民日报》3月2日为此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1月31日，黑龙江省造反派在驻军支持下召开“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布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夺了原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人民日报》2月2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5〕据当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公社’不是上海发明的，首先是北京发明的。是陈伯达打电话给上海，通报北京准备成立公社了，要上海考虑成立公社。”见王力的“‘文革’第一年”，《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6〕见这次大会发出的《第三号通令》。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给中央文革小组写的情况简报中也说：大会“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见范文贤的“无法无天的上海滩一所谓‘一月革命’始末”，《上海法制报》1986年6月30日。

〔7〕这四次夺权是：第一次，1月15日凌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所谓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联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下属的第二兵团（即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简称“二兵团”）等造反组织，宣布夺权；第二次，1月22日中午，上三司再次宣布夺权；第三次，1月24日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宣布夺权；第四次，2月2日，以二兵团为首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宣布夺权。席宣、金春明认为：“上海的夺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他造反派组织并不满意于工总司在张、姚支持下独掌大权的局面。因此，在1月6日

打倒市委大会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其他组织曾经发动过四次全市性的夺权……。”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33页。

〔8〕1967年1月29日，“二兵团”联合了“工三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工总司”的反对派，组成了火线指挥部，与“工总司”在南市区斜桥武斗，后因“炮打张春桥”事件而中止。

〔9〕出处同注〔2〕，第198—199页。

〔10〕《文汇报》发表“告全市人民书”之前曾请示姚文元，姚的态度十分冷淡，拒绝表态。王洪文虽参加了起草“告全市人民书”的会议，但他认为这“是个阴谋”，中途退出，只好由工总司别的负责人代为签字，签字者事后遭到王洪文的指责。《紧急通告》起草时，王洪文拒绝出席会议，还指使一些人到会场大吵大闹，说反对经济主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大方向错了”。王洪文也拒绝代表工总司在“紧急通告”上签字。1月8日下午各造反派组织通过“紧急通告”的会议曾邀请张、姚参加，但他二人不赞成批“经济主义风”，拒绝出席会议。

〔11〕1967年元旦凌晨，在陈丕显召集造反派组织负责人隍7d会前一小时，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机联站”头头徐景贤，告诉他，周总理打电话给陈丕显，要陈解决铁路交通中断事宜，你们不要让陈抓到“辫子”，而要抓陈的“辫子”。又说：“曹获秋不能出来了，现在要陈出来。陈丕显的帐，你们要清算，以后算。”所谓的“以后算”，也就是暂时不要打倒，让陈丕显出来工作，好在工作中抓到陈的“辫子”再把他打倒。既然在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采取“让陈出来工作”的方针，当然就谈不上策划“一月夺权风暴”了，而当时的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当然也仍在继续掌权。

〔12〕连张春桥、姚文元也承认，上海市的造反派直到2月初仍未夺得权力。在2月1日镇压了“红革会”之后接见上海其他红卫兵组织代表时，姚文元说：“当前，上海广大革命造反派有两项首要任务：第一，斗争陈丕显、曹获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大联合，大夺权。这两项首要任务，都给红革会破坏了！”（叶永烈，《张春桥传》，作家出版社，第195页。）此话说明，直到2月1日造反派在上海还未完成大联合、大夺权这两项“首要任务”。

〔13〕出处同注〔2〕，第175页。

〔14〕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7年1月17日第11期。

〔15〕出处同注〔2〕。文革中陈伯达向群众发表讲话时，因其福建口音难懂，通常都由王力“翻译”。此处王力将陈伯达批评“接管风”的讲话错记成了批评上海夺权。不过，王力关于毛泽东在那次大会后马上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夺权讲了一大篇道理的记忆，应是可信的。

〔16〕1967年10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上海革命人民和驻沪三军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发表讲话（见次日《人民日报》），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历程时康生说：“1967年1月初，毛主席又亲自点燃了上海‘一月革命’的熊熊烈火，……‘一月革命’风暴首先在上海掀起。”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全会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央《政治报告》中说：“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17〕山西夺权，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被江青召到北京，派关锋与他谈话，叫他回去夺权的；贵州夺权，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得到“中央文革”赏识，被召到北京，江青亲自叫他回去夺权的；青岛和山东的夺权，是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通过康生之子张子石，了解到“中央文革”关于夺权的精神而组织实施的；黑龙江夺权，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得到与“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即该组织骨干）的支持而进行的。

〔18〕《陈永贵沉浮中南海》，花城出版社，第103—106页。

〔19〕张春桥在1967年2月24日上海文化广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说：“1月6日的大会上就夺了权了。”见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第173页。

〔20〕如《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上海“一月

风暴”》条目中写到这次大会时就说：“大会发出通令，不再承认曹获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随后，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组织联络站’，取代了市人委、公安局和市委，全面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67年1月6日”条目中记载：“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上海造反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21〕出处同注〔2〕。

〔22〕如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就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月11日给上海造反派（祝贺他们发出《紧急通告》）的《贺电》“大大地提高了上海‘一月革命’的地位，扩大了这场夺权风暴的影响”。

〔23〕陈丕显曾打电话通知张春桥：“报上登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要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我和各个左派组织提出意见，我们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出处同注〔2〕，第200页。

□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2期（总第73期）

~~~~~

### 【史实辨析】

#### 对上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

• 王年一 •

研究“文化大革命”不能不研究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一月革命”是怎么酿成的？毛泽东为什么支持上海夺权？反革命分子张春桥怎样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回答。不揣鄙陋，这里写下一些看法。

—

1966年11月10日发生了王洪文等人卧轨拦车的“安亭事件”。张春桥在处理这一事件中的表现极不寻常，这为“一月革命”埋下了伏笔。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陈伯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做了两件事：（一）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中央文革决定派张春桥回沪说服工人。（二）致在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指出：“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又说：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即日回沪处理此事。

张春桥离京前，陈伯达把致工人电原稿给了他，陶铸指示：中央不同意工人成立全国、全市性的组织，决不能承认“工总司”和肯定他们的行动。11月12日，张飞抵上海，即去安亭，与王洪文等几个头头打得火热，并在大会上当众答应第二天回上海解决问题。11月13日，从下午一点开始，张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工人座谈，他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应该创造好的经验。”“工人同志要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革命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下午三点半，张讲话，完全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还在书面五项要求上写上“同意”并签名。五项要求是：“（1）承认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组织。（2）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

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3)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4)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方便。”

这与周恩来、陈伯达、陶铸和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意见截然相反,与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截然相反。耐人寻味的是:张春桥是先斩后奏的,而中央文革迅速同意了他的处理。张春桥说过:“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这样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1966年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在苏州的工人时的讲话)

张春桥这一手确实不同凡响,阴险诡谲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深知毛泽东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支持造反派的态度和要把“文化大革命”引向工矿的意向,因而忽出“奇招”,顺水推舟地提供了全国第一个强有力的工人造反派。他深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各种矛盾激化,全国和上海的形势名曰“大好”,实则大为不妙,因而只要工人回到上海,出现工人造反派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决不会因支持工人造反派而获罪。他之所以先斩后奏,决不是因为“来不及”,而是要露一手。他之所以敢于别出心裁,不仅因为中央文革里大都是他的同伙,而且因为他后面有着几千名工人造反者和卧轨玩命的亡命之徒王洪文之流,他以上海的事态压北京。他的卑鄙目的,不仅在于把上海市委置于群众的对立面,给上海市委强加以顽固推行“资反路线”的罪名,不仅在于扶植反对市委的力量,不仅在于为自己培植反革命帮派势力,而且在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烧到工矿,造成全国动乱,以便实行夺权。他的诡计得逞了。1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他的处理,并且指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为什么批准,我们在下文再说。张春桥踌躇满志,他说:“这一段时间内,虽然时间不长,……对我来说,也会成为永远忘记不了的事情。”(同上)“工总司”得到如此的支持,在全国也属罕见。支持在“造反宣言”中声称要“夺权”的“工总司”就意味着迟早要否定上海市委,也就是埋下了“一月革命”的定时炸弹。

中央文革一伙人此后放肆地煽动工人“造反”。11月16日,戚本禹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讲话,他说:“上海市工人要成立团体,不让他们成立,……轰起来了,闹起来了,解决了。”“我教你们办法,……你们把三千多人分成三班,包围省委。他不答复你们的要求,你们就不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 二

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这不仅与“工总司”有关,更与工矿开展“文化大革命”有关。而工矿开展不开展与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正是“文化大革命”如何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央原先确定工矿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请毛泽东审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并给毛泽东写信,说明文件的基本精神在于:“文化大革命”“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毛泽东7月2日复信同意,同日通知下达。《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与通知的精神一致。为了制止“造反”浪潮对工矿的波及,9月14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规定“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当周恩来后来在一个会议(1966年12月6日中央常委会议)上说到“过去我们批准的,工厂、农村不能搞(文化

大革命)”时，林彪还插了话：“我们也是同意的。”但是，10月间，在猛烈批判“资反路线”的刺激、诱发下，工矿人数极少的造反派开始“造反”，这正中中央文革的下怀。11月8日，张春桥与“北航红旗”五人谈话，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11月中旬，正当张春桥去上海、安亭、苏州时，陈伯达等人草拟了《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11月17日还拿到工人代表座谈会上去征求意见。《十二条》基本精神有两个：一是“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好得很”；一是“各级党委、工矿领导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有了张春桥对“工总司”的支持和毛泽东的批准，“左”的《十二条》被认为“右”了，被推翻了。张春桥说：“《十二条》要大修改，根本不是正式文件。”（1966年12月6日接见“工总司”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

以张春桥支持“工总司”为契机，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造反派身上。当时形势严峻。这里有两个重要情况：（1）批判“资反路线”使种种矛盾激化。群众中两派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到了冲击一切的程度，无政府主义到了炮打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程度，生产下降到了难以制止的程度。（2）“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遭到广泛的抵制。陈毅等老帅实际上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于11月间两次在数万人大会上大声疾呼，反对错误做法。上海五十万市民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反对“工总司”等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广大干部、群众内心对造反派不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仍然是少数派。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别有用心地通过支持“工总司”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药方，这就是今后主要依靠工人造反派。这本来是火上加油，饮鸩止渴，但是毛泽东既想彻底改变社会面貌，也指望通过工人阶级走上“文化大革命”的舞台来摆脱重重矛盾，就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造反派身上。

在工矿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内部有过尖锐的斗争，这集中反映在11月下旬的工交座谈会上。陶铸鲜明地站在正确方面。王力说过：陶铸“千方百计地阻止对刘邓反动路线的批判，……特别是工农运动起来，更是沉不住气了。工人农民刚起来，形势好得很，他认为不得了了，一定要压下去。”“陶铸还反对提‘反动路线’这个词呢！”（1967年1月9日在新华通讯社的讲话）周恩来也力图阻止错误的发展。工交座谈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种种错误做法的不满，周恩来11月22日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要谷牧搞了一个汇报提纲，反映工交战线的真实情况。陈伯达指责汇报提纲，被周恩来顶了回去。参加工交座谈会的部长们也站在正确方面。周恩来12月6日在中央常委会议上说过：“这次座谈会……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中央各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

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站在错误方面，他们利用与助长“左”倾错误，提出“工矿问题比文教战线更加严重”的荒谬观点。林彪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说：“我们平常抓经济建设是抓得紧的，这是好的。”这时却说：一定要彻底打破“工矿比较纯洁”和“工矿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的估计，在工矿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康生12月4日在中央常委会议上说：“资本主义复辟，在工厂方面，关系很大，因为它是经济基础。”他在会上还胡扯了一番“理论”：“社会主义工业向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它们形式上是‘公’，实际上是‘私’，形式上是‘新’，实际上是‘旧’，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康生还提出了批判所谓“生产力论”的口号。更加严重的是：为了证明在工矿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林彪作出了“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的荒谬论断，还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

12月初的中央常委会议在工矿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上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左”倾的《十二条》变成更加“左”倾的《十条》（即《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毛泽东批准了《十条》，不久又批准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确定在



工矿、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严重的步骤。这固然是批判“资反路线”的恶果，也与张春桥支持“工总司”有着难解难分的因缘。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动乱，正是全国动乱孕育了“一月革命”。

### 三

1966年12月，形势险恶。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被冲击、被打倒，甚至被囚禁，群众之间的矛盾尖锐，无政府主义猖獗，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几乎荡然无存，生产继续下降，人民惊慌地注视着“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骑虎难下，进退维谷。

在这个月里，毛泽东有一些重要言论。他对张春桥等人说，要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进行全国性的大批判（转引自张春桥1967年2月25日与华东局造反派座谈时的谈话）。他对一个兄弟党的领导人说，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尖锐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存在的东西（转引自康生1967年3月10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他还说过：“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转引自席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载《党史通讯》1983年第一期）毛泽东在12月25日对中央文革成员说：“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并且估计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转引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第200页）。毛泽东12月下旬审阅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时在文末加了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他还审定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967年1月2日，他说：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转引自张春桥1968年2月5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执着于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左”倾空想，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不能面对现实，不能接受实践给予的启迪和警告，这样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在“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他为了证明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一方面毫无根据地对党内路线斗争作了新的解说，一方面毫无根据地给予“文化大革命”无以复加的高度评价。他决心大干一场以彻底改变现状，对未来抱有更多更大的幻想，“左”倾错误急剧升级。

1966年的实践充份说明，毛泽东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革（“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主观主义的，本来就没有正确的方法、步骤），只是一味支持“造反”而已。从1967年元旦社论提出的1967年四项任务中可以看出，还是既提不出任何积极的主张，也提不出“文化大革命”如何发展的意见。尽管“一月革命”的怪胎已躁动于全国动乱的局势和大干一场的决心的母腹之中，但是这时并没有提到也没有想到“全面夺权”。

既然寄希望于上海的造反派特别是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江青一伙就开始做文章了。在他们无法无天地打倒陶铸（他因正确地反对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反对批判“资反路线”、反对在工矿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而获罪）的同一天，张春桥、姚文元赶回上海策划夺权，为他们制造的怪胎催生。在1966年12月，张春桥就秘密策动上海市委机关徐景贤等人“杀出来”。12月下旬，他又制造了“康平路事件”，镇压上海“工人赤卫队”，进而把上海市委和各级组织搞瘫痪。1967年1月1日，他在致上海电中公然宣称：曹荻秋不能出来了，陈丕显的账要清算。1月2日，他指使“工总司”等造反组织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委会”。凡此种

种，导致了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夺权。“上海的桃子熟了。”（张春桥1967年3月8日接见山西省太原市代表时回顾“一月革命”的讲话）1月4日张、姚回到上海后，找“工总司”的头头和徐景贤等人谈话，透露了毛泽东1月2日指示，策划夺权。1月6日，他们主要依靠“工总司”和上海市委机关造反组织，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勒令陈丕显交代所谓“罪行”。会后，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张、姚等人手中。张春桥说过：“一月六日的大会上就夺了权了。”（1967年2月24日在上海文化广场的讲话）会前是报告了中央的，中央默许而未明确表态。

张、姚很明白，开一次大会还不够，要牢牢地在实际上控制上海，特别是控制上海的经济部门，这样才能得到承认。从来只抓“革命”，破坏生产的张、姚，旋即指使造反派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是一箭三雕：一是“坚决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上可以取悦毛泽东，下可以讨好上海市民；二是把破坏生产的罪名强加给上海市委，置上海市委于死地，不动声色地取代上海市委；三是颇为“正当”地扶植和支持造反派。1月8日这个指挥部成立后，夺取了许多局的领导权。张春桥说：“我和姚文元商量，……搞了个联合指挥部，这才夺了权。……我们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从文汇报的夺权肯定了这是必要的。”（1967年10月22日接见安徽代表时的讲话）毛泽东1月8日同中央文革成员谈话中所说“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等内容，就在实际上表示了这种肯定。

这个谈话和据此写成、又经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1月9日编者按语相当微妙：它在实际上号召全国进行全面夺权，却无号召夺权的语句；它在实际上肯定了上海的夺权，但也无明确肯定的字样。《人民日报》1月9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还删去了“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一语。无论就全国还是就上海全市来说，在夺权问题上，毛泽东大概还要看一看。

当时，陈丕显支持而张春桥反对那个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详见金春明《上海“一月革命”的前前后后》，载《党史通讯》1983年第十八期）《紧急通告》1月9日在《文汇报》发表，毛泽东因其切中时弊而大为赞赏，要中央文革代拟中央致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央于1月11日发出贺电。张春桥却把自己装扮成反经济主义的“英雄”，把大搞经济主义的罪名栽在陈丕显、曹荻秋头上，翻云覆雨，莫此为甚。（经济主义是江青一伙搞起来的，请见《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书第131—132页。该书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江青接见了“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头头，“十一月”应作“十二月”。又，江青在这以前就煽动搞经济主义。1966年12月18日，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代表时说：“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套”）《紧急通告》已经指出“上海市委被打倒”，但它毕竟不是夺权的通告；中央贺电高度评价了《紧急通告》，但其主旨是反经济主义，而不是号召夺权。事实上已经同意上海夺权，但尚无明确表示；这实际上已经含蓄地号召全国夺权，但尚未明确提出。毛泽东知道事件的份量，要明确支持与号召夺权，尚费踌躇。

老奸巨滑的张春桥，很能揣摩毛泽东的思虑，这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所谓“大联合”问题。这是在1月12日上海“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通过“工总司”等组织发起建立全市性的“造反派组织联络站”提出的。所谓“大联合”实质上是大分裂，但是这个提法有种种妙用：既可以用以冒充民意，又可以用以使造反派聚结在自己周围，还可以用以约束和压制反对自己的群众。尽管如此，“大联合”毕竟是正面的、动听的提法，所以迅速被采纳和推广。1月15日，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张、姚以不是“大联合”为由未予承认，并花言巧语地报告了中央，还说什么“群众”要求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上海新市委”工作。张春桥说过：“主席看见我们的报告后，对我们行动非常支持。主席连夜召开政治局会议，认为上海这个办法好。以前北京由中央决定自上而下改组，没有解

决问题。由群众提出，哪些人可以当领导，担任什么工作，这个办法好。”还说：“一月十六日，主席批准夺旧市委、旧人委的权。”（1968年2月5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月16日批准之说可信。周恩来1967年1月26日在工交各部造反派座谈会上说过：“到一月十六日决策了”。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引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文章是毛泽东审定的。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号召全国全面夺权。至此，历史性的错误铸成。在社会主义社会还要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非常悖理的。

杨秀峰生前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在一篇文章（《审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为区别处理罪和非罪树立了范例》，载1981年1月8日《人民日报》）中说：“还有一些问题，林、江一伙的罪责，和领导上的错误交叉、纠缠在一起，不能分清，例如‘一月风暴’、‘二月逆流’等”。“一月革命”是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利用急剧升级的“左”倾错误，一手制造的。“文化大革命”一错再错，批判“资反路线”造成天下大乱，提供了夺权的条件，张、姚又提供了夺权的“样板”，使得迷信“文化大革命”因而根本不可能改弦更张的毛泽东不得不走上号召夺权的歧路。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情况下，在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号召夺权不是什么“伟大的战略部署”，而是唯一的去路——也是绝路。《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虽然提出了“夺权”问题，但是在1966年5月、8月末未就想到要号召全国进行全面夺权。不能说这个号召与《五一六通知》、《十六条》无关，但是肯定可以说它与1966年底进退维谷的局势、对前景怀抱主观主义的空想更加有关，它是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

□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九）

• 周孜仁 •

（续上期）

## 十二，迷惑与动摇

使我对革联会发生动摇的事情好像发生得有些突然。

本来，3月15日那天还好好的。我的日记上这样记录了当天的情况和情绪：“革联会召了全市造反派的宣传通讯会议。警备司令部作了形势报告，很好。/西师八三一垮台后，斗争缓和了，没有什么对立面，到处是升平景象。每天都有人来报喜报捷，人们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生产都搞好了。这个场面真有意思，在革联会工作的老百姓出来接见报捷的老百姓，互相鼓励，互相祝贺，多有意思！多么感动人！/回学校跑了一趟，似乎一切都正常了，从今天起，机械系就开始军训了。整整半年没有见过这种秩序，我感到有些不习惯。/我很想走了，走到遥远遥远的边疆去！/正如一雏鹰，他在风暴里练硬了翅膀，要到远方去飞行了。”

3月16日这一天，报社让我和黄天俊去天府煤矿采访一个大会。天府煤矿很远，从市区到了北碚，过嘉陵江，还要坐好长一段小火车才能抵达。西师也在北碚，他们之间的距离相对

就近多了，831的造反学生自然在那儿影响很大。毛泽东和刘少奇当初闹革命不都在安源煤矿搞过革命煽动吗？现成一个煤矿就摆在面前，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年轻人，当然要以伟大领袖为榜样，要去那儿找矿工串联串联。天府煤矿这就成了831的“红色根据地”。3月8日，西师831垮台，头头被抓，对于它的“红色根据地”意味着什么，已经不言自明了。3月16日，该矿山召开大会，就是要把被砸派夺了的权重新夺回来。这是一个阴天，才到下午，天就很灰暗了。天空飘着飒飒冷雨，让人心里很压抑。我和黄乘船渡过嘉陵江，等运煤的小火车来了，又坐了好远才到目的地。

大会是在矿区的礼堂举行的。礼堂很简陋，用油毛毡搭成，却大，能容得几百上千的人。我们向煤矿当局的军代表说明了来意，然后便去了会场：礼堂里已经人声鼎沸。接着开会，主持人很神气地宣布大会开始，然后便宣布把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揪上台示众：名字很长一串。被点名的人显然早有准备，主持人话音一落，马上乖乖地从各个角落钻出人群上台站好，低头，在台上站了整整一大排，恭恭敬敬作弯腰服罪状。其中有事前将公章带好者，上台后便抖抖嗦嗦把公章倒在主席台上，以示交出权力：这些图章，我猜他们还没机会盖几回。接着大会发言，声讨“牛鬼蛇神造反”“右派翻天”的各种“滔天罪行”。发言我无法记起了，唯一印象深的就是：我首次发现，一个单位的公章集中起来，会有这么一大堆！

不久后我就知道：那些主持“反夺权”会议的，都是不久前才被815派打垮的保守派组织“工人战斗军”的骨干们。于是我就很不顺气了。

其实我的不顺气，从天府煤矿回来的第二天就开始了。我和黄天俊回他的学校西农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去831刚刚被打垮不久的西师看看。一进校园，就觉得整体气氛有些异常，和城里的平静不一样，好像被一种什么东西激动得焦躁不安。大家都很忙碌冲动。有点像815事件爆发前的情况，似乎随时会发生不祥。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记不起什么地方了，好像是一个水池边上）绳子上新挂出几张大字报，人们正围着争论不休。我们挤上去，才知道是原831一位同学写的，大意是为被打成“右派组织”的831鸣不平。文章一出，这个同学立即遭到气势正盛的“春雷”战士的批驳，“春雷兵团”理论上是从831内部反水出来的，为首的和骨干分子确实都是些老造反，但短时间却吸纳了大量“思想兵”和赤卫军参加，所以被砸派认为是“老保翻天”组织。前面说了，重庆人管“老保”叫“麻子兵”，因此呢，砸派就管“春雷”叫“春麻儿”。不管怎么说，“春”字总是代表美好代表清纯的，因此后来砸派的漫画总是把“春雷”画成娇滴滴的二八佳人，而把学工科的“重大815”画成五大三粗的壮汉，二人总是在下流无比地调情——这是后来的事。却说那张大字报前的辩论很快就愈演愈烈，气势正盛的“春麻子”和“鸭子死了嘴巴硬”的831全都涌来参加舌战——非常莫名其妙，当时，我和黄天俊二人公然帮着831辩论起来，只是后来觉得身份不对，这才走了：解放台还有一个大会等我们去采访。

解放台是一个露天广场，地处北碚街区。这一天是重庆难得的晴天，太阳暖洋洋的，又开大会，但我的印象却并不热闹。主要听众好像都是西师的学生，都集中在前排。我和黄就远远站在后面。站在后面我还遇到好几个我们学校来此看热闹的同学。开会情况和前一天在天府煤矿看到的差不多。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宣布把“反革命”某某、某某某揪出来示众。今天的某某某只有八九人，首要分子就是前面说过的西师831的七个主要“勤务员”：周荣、羊衍海等，其中有一位女士，就是周德英。这些某某某一上台同样站成一排，低头，恭恭敬敬作弯腰服罪状。不同的是，今天的某某某全都戴着手铐，因此更显得杀气腾腾。另外就是让人有一种特殊感觉：他们确实实和我们不一样了，真成敌人、成阶下囚了，年纪轻轻的他们，这一下真的全完了！问题是，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和我们一样：造反、受气、威武不屈、叱咤风云。和“黑市委”浴血奋战。事情为什么一下子变成这样了呢？831垮台这件事我们当然是知道的，

甚至为此而弹冠相庆，可真正看见这帮哥们儿被弄在台上可怜巴巴地低头示众，而且还铁铐银铛，站在后排的我们，好像忽然间忘记了他们曾经如此讨厌地和自己作过对。我记得一位同学当时就愤愤不平地问我：“这样对待革命小将，对吗？他们也是造反派啊！”

这个同学叫余明庆。人白净而清瘦。脾气极“冲”。他有一句口头禅：“现（才扁）！”。“现（才扁）”是重庆土语，翻译成普通话就是：“马上揍！”“现（才扁）”也成了他的绰号。武斗时“现（才扁）”担任重大“301野战部队”的发报组长，在“华莹山根据地”闯过一次大祸：为了在女同学面前“冲”一回，他在夜里误发了三颗信号弹，让整个“根据地”一场虚惊，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为此，曾被武斗队的哥们儿们“（才扁）”了个鼻青脸肿：这是后来的故事。1967年3月17日那天，他在北碚解放台的斗争会表露的情绪代表了我们的共同的不满，于是一起退场了。那一天，我的日记这样写道：“晴朗的星期日。在北碚解放台由春雷主持大会，斗争831的几个头目。做为一个造反派的我，看到这情景，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